

## 绪 论

作为相对独立的一段特殊的历史，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出现在统一格局之后的“乱”世。所谓“乱”是指周王朝自西周初年以来的严密统治开始被打破，礼乐征伐渐次由天子而诸侯，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家臣，这一时代特征史称之为：礼坏乐崩，王室衰微。然而，也就是在这一“乱”世之中，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却因此而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看问题，士阶层的崛起和活跃，更是这一时期历史的重大变化和重要收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士人阶层的崛起与活跃，遂使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也因此使这一时期的历史从整体上增加了深度和魅力。

围绕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人阶层和士人群体，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实在很多，所涉及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就笔者目力所见，学术界已刊布的重要研究成果，前有从历史演进角度讨论古代士之起源的顾颉刚先生的《武士与文士之蜕化》<sup>①</sup>，近年来又有从文化史角度立论的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sup>②</sup>，和从社会史角度展开讨论的刘泽华先生的《士人与社会》<sup>③</sup>相继问世。前圣和时贤的诸多研究成果为我们展现了古代士人研究的广阔思路，也同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取镜的借鉴。但是，即使如此，中国古代士人研究，特别是对先秦士人研究仍有可置喙

者。我们认为 从官府散入民间 而又从民间回到官府 是春秋战国士人从整体上展现出的一个历史走向 也同时是他们共同走过的一段心路里程。在这个历时性的行进过程中，暗含着的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共时性问题，那就是士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我们看来 如果不绕弯子、不兜圈子 径直以此一问题立论 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各主要学派士人由点到面的描述和分析，同时兼采前圣和时贤的方法与思路，就可以作到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立体地展示和说明春秋战国士人在这三二百年间所经历过的精神流程，并且透过士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理想和现实立场选择的变化，映现那个时代的政治变化及其后果。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论题的真实想法所在。当然，选择讨论问题的基点虽与前人不同，但讨论的展开却仍然不得不从最基础性的问题入手。

## 一、士人崛起的历史因缘

追溯古代士的起源 顾颉刚先生断定“吾国古代之士 皆武士也”的说法所指陈的，仅仅是一个大体可信的事实轮廓，且不说由“武”向“文”的变迁需要作更细致、充分的论证 即使仅仅证成古代之士起源于武士，也需要更为可靠的文字训诂根据。据古文字学者的考证，士字构形所像为武器，其初义表示兵刑，并引申为职掌兵刑的身份官称，西周金文及先秦文献记录有职掌兵刑狱讼的官称为“士”或“司士”用的就是士字的最初语义。士作为掌兵刑狱讼的官名的语义进一步引申，就成为担任官职者的泛称。春秋金文中常见“诸士”、“士庶子”等，“士”即泛指任官者。

士既为官称，遂演变为官爵。由初义表示兵刑，到引申为掌刑狱的官称，并进而演变为官爵名，这是士字语义在先秦时代的演进历程。此外，士字还有三种语义：一是军士，二是男子之称，三是有才能者的通称。这三种语义在西周至战国的金文中也可找到证据<sup>④</sup>。

与士字语义的演进相类似，士在西周至春秋末年的历史变迁中，其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顾炎武曾说：“武王作《酒诰》之书曰：‘妹士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此谓农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则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sup>⑤</sup>春秋以前，周王朝中的有职之士，或担任武士以保卫社稷，如《晏子·内篇·谏下》说：“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或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行政机构中担任职事官吏，如《国语·周语上》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韩诗外传》则说：“大夫擅官，士保职。”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在周王室中供职的士就有宫正、宫伯等几十种之多，而《周礼·地官·司徒》所记士在基层行政机构中任职的名目之多就更难胜数了。上述两项之外，还有一部分士是担任了卿大夫的邑宰和家臣，为卿大夫管理采邑和家族的，这也是于史有征的历史事实<sup>⑥</sup>。

从上述士人任职的情况看，不管是担任保卫王室职责的武士，还是担任王室及诸侯的行政职事，以及做卿大夫的邑宰和家臣，就其任职的性质而言，无疑都属于服务性的。在宗法制度严格的西周社会里，任职的这种服务性自然与士本身在宗法秩序中的附属性处境有关，而士人的附属性处境又内在地成为其任职服务性的根据，这是当时士人生存的外在限制之一。外在限制

之二，由于士主要担任自上而下各级官方机构中的职事，限于职业的需要，士人所学习和掌握的也必须是实用化、工具化的知识。为配合这种需要，周王朝的官方士人教育培养方式为“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sup>③</sup>杨宽先生更认为：“当时贵族生活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但是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他们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的。”<sup>④</sup>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被限定在周王室贵族的生活范围之内，学习和掌握非常实用的、工具性的技能，来为王室和大贵族服务，这就是自周代初年至春秋年间士人存在的基本社会定位，庶几也是人们把士作为贵族系列中最低一档的理由。

不用说，西周王朝对于士人，从教育培养到选拔任用都是按部就班形成制度化的，由王朝一手包办的，也就是说，作为教育培养机构的“辟雍”和“泮宫”是周王朝政治机体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所培养出的人才也是通过“论定，然后官之”<sup>⑤</sup>直接成为王室或诸侯国中方方面面的职事官吏的。由此可见，从周代初年到春秋中期，士人的培养和任用，从头至尾都是官办的。然而，进入春秋末年，士人培养和任用的官办局面开始被打破。很显然，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首先来自于政治。由于周王朝自周平王宣白元年（公元前 770 年）东迁以后即开始式微，而从鲁僖公九年（公元前 651 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确立霸主地位起，到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 473 年）越国北上灭吴建立霸权终，这近二百年间诸侯的数番攘夺更使周王朝的统治渐趋于名存实亡了。这一旧有政治格局和统治秩序的崩析和瓦解给当时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而它带给士人的则首先是原有制度化的士人培养和任用方式的被迫中断，官学培养下的

士人地位明显开始下降，官学的命运也差不多走到了它的尽头。特别是葵丘会盟时制定的盟约中针对“士”的条款明显地苛刻了：“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sup>④</sup>由此而产生的影响表现得十分突出，比如就在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 525 年）东方小国邾国的学者邾子到鲁国进行朝拜，在朝拜过程中，邾子表现出了对历史和礼仪制度远超出鲁国本土人士的博闻和精识，据载：“仲尼闻之，见于邾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sup>⑤</sup>《论语·微子》篇所谓：“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虽然还无法完全断定此一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但如果说它大体发生于春秋中后期至战国初年当不致于太错，而它所透露出的确也是官学四散的消息。周室衰微，官学四散，给士人阶层带来的问题是双重性的，即它既切断了周王朝提供的任职机会和俸禄来源，使世袭、兼摄等具体可见的政治、经济依靠变为全无凭借、全无依附，同时，士人又在失业之后被推进市场的情况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更大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困难和机遇同时降临在士人面前，这是春秋战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新政治变化发生之际所首先带给士人们的，士人们必须对此作出抉择。

诸侯壮大、权力下移对周王朝产生的威胁是致命的，与之相联系，士人也因此割断了自身与周王朝之间的连结脐带。显而易见，士人在失去周王朝的政治、经济依靠之后，生存问题便自然成为当务之急。这其中除了很少一部分士人仍然保有官职禄位之外，其他大部分士人则必须重新选择出路和生路。由此，士人的求生之路又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受教育较低、修养较差者，他们不免流为庶民，或充当社会侠客，或投于新贵门下做起食

客。另一种士人因为受过较高的教育，拥有六艺等传统文化知识，在失去官守后，便自觉成为读书人、学者。他们靠钻研学问、聚徒讲学，既据此以维持生存，也因此而传播思想，成就事业。我们在本书中所要讨论的士人，就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这后一种士人，这是需要在这里予以明确的。当然，以读书、为学为职业的士人并不能囊括春秋战国士人的全部，但是这部分士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以及由他们的思想、行为所显示的风格和倾向，适足以映现和代表那个独特的时代。在这些以聚徒讲学、传授知识和思想为职业的士人中，著名者如郑国的壶丘子林、邓析，而在鲁国，孔子和墨翟的学术活动更蔚为壮观。史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sup>⑫</sup>墨翟则“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sup>⑬</sup>随着求学人数的增多和学术影响的增大，以孔子为开山鼻祖的儒家和以墨翟为第一代巨子的墨家竟成为轰动一时的“显学”。而伴随这种钻研学术、聚徒讲学活动的展开，士人们也开始独立思考上下古今、天地人间的种种问题，并把这些思考逐一书之于竹帛，从而形成为不同学派的不同学说。

王室衰微，权力下移，从而使士人与宗法秩序和王朝政治渐次脱钩，这是春秋末年士人获得新的发展契机的外缘，而士人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知识和技艺修养又是士人崛起和勃兴的内因。如果没有这个内因，面对时代机缘，士人所作出的恐怕会是另一种选择。如果没有时代提供的机缘，士人自身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艺恐怕也永远只能作为为王室和贵族服务的资本和工具。在春秋战国之际，这因与缘的历史际遇，却共同奏响了士人生存新时代的序曲。如果略去若干过于冗长、过份琐碎的历史细节，从长时段、远视界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历史巨变对于

士人的意义，还不仅仅是促使他们游离出旧有的等级秩序和从过去的氏族血缘桎梏中解脱出来<sup>④</sup>，而更为重要和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士人由身份的自由而随之带来的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他们在眼前的历史境遇下可以自由地选择居住地，自由地选择职业，同时也可以自由地建构自己的思想学说和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从根本上讲，春秋末年以前士人所具有、所擅长的知识和修养仅仅成为自身服务于他人的工具和手段。而现在，以往的手段变成了目的，过去被工具化了的知识和修养又真正回归到了它自身。以思想和学说为维持生存的重要资本，也同时以此为精神创造和价值追求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这是春秋末年士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新起点。

## 二、新格局下的新需要

春秋末年士阶层的独立和崛起，其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士人自身的往日形象，也同时因此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世俗影响，特别是一向被认为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事生产的文士的地位变化和影响尤其引人注目，竟发生所谓“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sup>⑤</sup>的巨大轰动效应。据《吕氏春秋·知度》载这一事件发生于赵襄子（公元前474—公元前425年）生活的时代。此后（约公元前430年）中牟人宁越弃农从学“十五岁而周威公事之”<sup>⑥</sup>，以“鄙人”之身、布衣之士，终于靠为学而成为王侯师。此类事件在当时的发生或许还不致于太过普遍，但它无论如何也是信而有征、极有说服力的例子<sup>⑦</sup>。由这一事实来看，士人在脱离了原来的封建附

属地位，由随贵族之后而成为四民之首以后，其独立性明显增强，自由度明显扩大，随之，社会影响力也日见其大起来。士人影响力的扩大，一方面来自于他们由社会地位独立而带来的能动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也与新的历史格局下新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有关。这后者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前者，并决定着前者的运行、变化及发展方向。

应该说，自春秋五霸开始，列国间的争霸战争就已经奏响了诸侯争夺天下的序曲。随着战事的频繁和争夺的日渐深入，人才问题越来越成为霸主间争胜的关键，所谓“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sup>⑩</sup>。“尚贤者，政之本也”<sup>⑪</sup>的观念正是那个时代诸侯对人才渴求的反映。此时诸侯的日趋坐大标志着他们已由过去周王朝的政治派出机构渐渐演变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政体组织，机构的复杂和严密使其对职事官僚的需求远超过从前，这一点成为士人渐受诸侯们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因为士人既有知识技能，又有思想见解，其在诸侯的内政外交方面常常能够发挥他人所不能发挥的作用，这又使诸侯们不得不加倍重视士人，利用士人的特有才能，以为诸侯安邦和争胜增加筹码。所以，时至战国初年，在各诸侯国中，礼贤下士普遍形成风气，布衣卿相也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其中著名者如魏文侯之重用乐羊、吴起、李克、西门豹、翟角，并且“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sup>⑫</sup>。鲁缪公任公仪休为相<sup>⑬</sup>，臣子柳、子思<sup>⑭</sup>。燕昭王师尊郭隗，后招致苏秦、邹衍、乐毅、屈景从四面八方“归燕”<sup>⑮</sup>。更有甚者如齐国自齐威王时开办的稷下学宫，前后竟招纳当时著名士子如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七十多人，并且“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sup>⑯</sup>。如此等等，各国君主的招贤纳士，或直接委士人以政治重任，或养士以立楷模于国人<sup>⑰</sup>，其尊士重士的方式

虽不甚相同，但希望因此而收到政治利益、获得政治效果却不能不说是各国诸侯们的一致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统治者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需要士人的切实合作，希望士人也力所能及地配合这种要求，对此他们表现出相当一致的倾向。而对不予合作的士人，有些执政者也不免提出严厉的批评和训诫，如鲁国的阳虎就曾批评孔子的“怀其宝而迷其邦”、“好从事而亟失时”为不仁、不知<sup>⑧</sup>，以敦促孔子尽快出仕为官，为当局政治献策尽力。有的执政者对“不业”的士人竟赤裸裸地以杀戮相威胁，如赵威后问齐使云：“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sup>⑨</sup>这位被孟子称之为齐国士人“巨擘”<sup>⑩</sup>的陈仲子，因有高名而坚持不与统治当局合作，竟深为握生杀之权的统治当局所深深忌恨了。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政治对士人的需求程度和统治者对士人的需求心理了。很显然，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家对士人的需求和任用，已与周王朝在此之前给予士人的待遇大不相同了。再有，进入春秋末年以后，不仅各国诸侯在对待士人的态度和待遇方面与周王朝的工具性使用不同，而且士人对其自身的社会定位及存在价值的认定也与以前大不相同。这主要表现在，士人随着自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改变而开始自觉地将拥有的知识和技能独立化乃至本体化，也就是说，他们开始以自己的立场为立场，以自己的思想为思想，凭着自己的知识、学问和思想与当下政治清醒地保持着某种距离，并有意和政治家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和对峙。这就是颜觸之所以敢于同齐宣王争尊<sup>⑪</sup>，子思之所以敢于对鲁繆公友而不师深表不满的原因所在<sup>⑫</sup>。后世史家常将此称之为道统的确立。

毋庸置疑，士人道统的确立是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一件大事、大事，它的出现使此期士人具有了确定自身立场的能力，也因此成为此期士人处理自身与政治关系的一个新起点。对于这一点，各国诸侯也普遍有所认识，统治者的普遍尊贤重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政治家在新形势下比以往更需要士人的支持与合作，而士人却具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自觉的自我立场。这样，在士人与当下政治之间既有可能合作、又有可能保持独立的基础上，士人与政治才具有了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关系的前提和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可以恃道以拒势，有了足以安身立命的真正资本；而政治家在寻求士人的政治合作方面却增加了更大的难度。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士人与政治关系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

### 三、基本思路与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诸侯为争夺天下而对士人普遍采取了宽容和尊重态度，以尽最大可能争取士人的合作与帮助。由于士人们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或由于阶级立场和文化立场不同，或由于拥有的知识资源及对现实所持态度不同，因而他们对诸侯政治家的招徕、吸纳就表现出不同的回应姿态，由此也就产生了儒、墨、道、法等派士人不同处理自身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区别。从整体发展走势看，如果说自春秋末年开，士人由于历史提供的机遇使其脱离了原来的附属性地位而成为一个有广泛社会影响和作用的独立的社会阶层的话，那么到了战国末年，士人却又重新被政治融入国家机器的系统程序之中了。尽管这种现象的出

现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是这一时期士人生命历程的重复，而是又一个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sup>94</sup>。但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士人的命运却似乎又吊诡似地从终点返回到了起点。由于政治格局的变动，士人被从官府抛向社会。同样由于政治的需要，士人又被从社会各个角落重新吸纳回官府。春秋战国士人从孔子到李斯所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段精神历程。本书就是企图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不同阶段士人的不同政治态度、不同政治境遇和不同价值立场以展现这段历程。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春秋战国士人与此前的士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此前的士人仅仅承担周王朝和各诸侯政治机构中的具体职事，他们所具有的知识、技艺包括他们自身，都是被工具化使用的；而春秋末年以后的士人则以自己拥有的知识、思想为资本以安身立命、以抗礼王侯。不用说，思想和学术不仅成为春秋战国时代士人与当时社会发生联系的中介点，也成为他们与当下政治发生关联的媒介。缘此，本论题的展开选择的是学术史视角，即从基本的学术思想、学理的梳理入手，以展现某一学派士人思想的先后传承及演变，在梳理士人思想传承演变的过程中，重点讨论各派各阶段士人的政治态度、政治理想及政治立场，在结合对士人事实层面的历史描述和历史考察之后，从而对士人给予尽可能客观和合理的政治定位与价值定位。由学术而涉及政治，由学术而进入政治，这是春秋战国士人参与政治的共同倾向、共同特征。因而，选择学术史视角，从学理梳理入手，以探讨士人如何在从事学术探究工作中、在学术思想建构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政治倾向和政治立场，如何借学术创造和文化建设以发挥政治作用，就势必成为本论题的首选思路。不难预料，由于笔者的学识和学力都有限，在对这样一个颇具难度

的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很难避免出现眼高手低乃至捉襟见肘的尴尬。但是，学术研究原本也不可能找到天衣无缝、十全十美的答案，发现问题并尽可能对问题作出力所能及的解释这本身就是富有建设性的。因此，对笔者来说，讨论此一问题成败利钝的最后结果或许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在遭遇令人绝望的困难之前必须先行进入所要探讨的问题本身。还有一点需要事先声明，本书讨论的范围为春秋战国士人，但事实上内容中并没有对各家各派士人面面俱到。史家司马谈曾把先秦学术分为儒、墨、道、法、阴阳、名六家<sup>⑥</sup>，此后的班固更有九流十家之论<sup>⑦</sup>。但是事实上原始史料保存较富且与当时政治发生关联较多者也仅有儒、墨、道、法四家。因此本书以讨论儒、墨、道、法四家士人与政治的关系发展为主而兼及其余，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注释：

- ①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5—91页。
- 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下引同。
- ③ 刘泽华主编：《士人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引同。
- ④ 参见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82—286页。
- ⑤ 顾炎武：《士何事》见《日知录》卷七。
- ⑥ 如《公羊传 隐公元年》：“宰士也。”《仪礼》郑玄注：“室老家相也士 邑宰也 是家相邑宰为公士 大夫之贵臣也。”《国语 晋语四》：“士食田 官宰食加。”韦昭注：“官宰 家臣也 加 大夫之加田。”这些均可以说明士担任卿大夫邑宰和家臣的事实。
- 《仪礼 王制》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 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7页。
- ⑦⑧ 《孟子 告子下》杨伯峻：《孟子译注》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引同。
- ⑨ 《左传 昭公十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引同。

- ⑫《史记 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标点本。下引同。
- ⑬《吕氏春秋 当染》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本,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下引同。
- ⑭参见《士人与社会》第35—38页。
- ⑮《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引同。
- ⑯《吕氏春秋 博志》。
- ⑰参见《士与中国文化》第16—17页及第85页。
- ⑱《管子 霸言》戴望:《管子校注》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本。下引同。
- ⑲《墨子 尚贤》孙诒让:《墨子闲诂》。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本。
- ⑳《吕氏春秋 察贤》。
- ㉑《史记 循吏列传》。
- ㉒《说苑 君道》赵善诒:《说苑疏证》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 ㉓《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
- ㉔《孟子 公孙丑下》载 齐宣王说:“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锺,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即属此类。
- ㉕《论语 阳货》杨伯峻:《论语译注》本 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引同。
- ㉖㉗《战国策 齐策四》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本 巴蜀书社,1987年版。下引同。
- ㉘《孟子 滕文公下》。
- ㉙《孟子 万章下》。
- ㉚关于先秦“士”向官吏的演变 可参阅步克:《荀子论“士君子”与“官人百吏”之别及其意义》载《学人》第三辑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 ㉛《史记 太史公自序》。
- ㉜《汉书 艺文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标点本。下引同。

## 第一章 儒家士人与政治

众所周知，春秋以前的士为贵族社会的最低阶层。但是经过一个时期的动荡变迁，到春秋末年，士则由最低级的贵族变为最高级的庶民，即所谓“四民”之首。政治地位下移，政治色彩淡出，这是那个时代士人变化的最主要特征。然而，士人在失去某些政治地位以后，他的文化身份却相应凸现出来。士不再成为单纯的王朝和诸侯官吏，而主要以古代文化的保存者、传播者和阐发者的身份出现，这是春秋时期重大的时代变化之一。而儒家则第一个扮演了那个时代弄潮人角色。

《汉书·艺文志》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淮南子·要略》篇也说：“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典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称引周典，推崇教化，这是儒家士人的基本工作。然而，春秋战国的儒者又有所不同。孔子开山立宗，取以文化批判参与现时政治的走向；孟子更把道德治世推向内圣的极端；而荀子则直承孔子传统，却削减文化批判的尖锐锋芒，径自把儒家的价值立场自觉向崇尚事功的外王方向转移。这是先秦时期儒家士人与政治关系发展的基本态势。

## 一、出入于为学和为仕之间

春秋末年，儒家孔子的存在及其活动，实在为那个时代增添了内容和意义。作为时代变局发生之后最早出现的士人，孔子不仅兴办教育，把学术文化由官府带进民间；整理编次古代文化典籍，使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精神传统得以保存和流传；而且他还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理论与实践，为那个时代的士人面对如何设计政治理想、如何塑造自身的社会角色、如何处理自身与当下政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示范。而这后一点在孔子的一生中，恰是他倾注心血最多，身后争议最大，也最具探讨魅力的地方。

### (一)

如果仅仅从士人的文化立场来审视和考察孔子，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常常显出其某种偏激和功利；如果执意坚持用政治尺度来衡量孔子，孔子弘放而又富于情感的文化态度又不免显得有些迂远和不着边际。然而，各执一端并不能合理地评价和定位孔子，假设的前提也不能再现真实的历史。似无疑问，孔子面对现实中的种种事象，为自身设计的理想和社会角色一般说来是切实的和可行的，《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这里孔子以高山

仰之的盛赞法排除了现实成‘圣’的可能性以‘仁’为现实中的最高人生理想，从而把个体士人的企达仁境作为现实人生的最高境界。实事求是地说，孔子的仁的思想包涵着相当复杂的内容，不是三言两语就能交待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的一生是追求意义的一生，而他又把仁的实现作为人生的目的和终点。问题就这样呈现出来了，孔子追求人生的意义，把仁作为人生之旅的终点，那么他是如何实现人生的意义，如何达到人生终点的？这关涉到孔子的文化态度，也关涉到孔子的政治态度。我们认为孔子对此提出了两条路线、两种途径，其一是所谓为学，其二是所谓为仕。《论语·子张》篇里“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虽然出自子夏而非出自孔子本人之口，但它却恰切真实地道出了孔子对春秋末年士人政治立场和价值立场的选择与认定。

## （二）

先谈为学。

关于“学”，孔子曾说过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话，我们如果对此稍加审查，就可以看出孔子的论“学”大体包括这样几个层面的问题，即为学的重要性、意义，为学的对象、内容，为学的目的等。关于为学的重要性、意义，孔子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sup>①</sup>“吾尝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sup>②</sup>“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sup>③</sup>“思而不学，则殆。”<sup>④</sup>“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sup>⑤</sup>等等。关于为学的对象和内容，孔子也有明白指示，《论

语》有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sup>⑩</sup>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sup>⑪</sup>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sup>⑫</sup>文之以礼乐。”<sup>⑬</sup>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sup>⑭</sup>照此说来，孔子指示的为学对象、为学内容，统而言之不外乎一个“文”字。而所谓“文”又包涵以下两种意义：一指自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及其理论，二指士人君子的道德规范。更具体地说，孔子所倡导的为学内容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后人所说的“六经”。比如孔子就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sup>⑮</sup>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sup>⑯</sup>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入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面而立也与？”<sup>⑰</sup>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sup>⑱</sup>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sup>⑲</sup>关于为学的目的，孔子也多次明确讲到，如《论语·子路》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在《阳货》篇中，孔子更认定学《诗》的目的就在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孔子看来，学习以《诗》为代表的古近典籍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事父”、“事君”，培养为人的道德和情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达政”、“专对”，用之于为政和外交，最起码、最不中用的也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增加做君子人必备的博物知识和修养。由孔子强调的为学目的，我们不难看出，他在理论上已经把为学和为仕联系在一起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进行详细讨论。

由于孔子积极强调为学的重要意义，明确规定为学的对象、内容，并积极主张学以致用，把为学的目的摆在检验为学成就大小的高度来理解。这样，一个自然而必然的结果就是，凡与上述